为什么欧美“突然”爆发恶性通胀

【任君评说】

核心原因在于国际热钱投向突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不影响通胀的楼市、股市、币市等“突然”转向大宗商品市场。这种“突然”既“突然”也不“突然”。

任寿根

严重的通胀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削弱居民社会福利和幸福感，引发货币贬值以及社会恐慌，所以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始终高度重视通胀问题。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的十几年，甚至往前再推一段时期，欧美等国家的经济运行状态似乎与通胀毫不沾边，一度实现了低通胀下的“豪华”式经济增长，但是，为什么2021年10月之后欧美国家“突然”爆发通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必要对此再深入分析。

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通胀。纸币时代出现之后，常常伴随着通胀现象。在纸币时代，如果发钞规模超出一定标准的“锚”或参照点，就会导致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是泡沫经济繁荣，要么是通胀。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中指出，通胀的本质特征为连续性的全面的物价水平上涨。费里德曼坚持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就是因为政府印钞太多，而且认为印钞太多是唯一的原因。费里德曼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观已深入人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应对通胀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货币政策，甚至有时是唯一的政策措施。通货膨胀肯定与货币超发密切相关，但超发货币为什么会引发通胀，费里德曼并没有说清楚。而且，费里德曼还指出，货币超发短期不一定会引起通胀，长期会引发通胀。这个观点难以解释这个事实，即自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发行钞票，直到2021年下半年之前这长达13年的时间里，欧美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通胀，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期间有的国家甚至一度出现通货紧缩。所以，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它与货币流向、国家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商品和服务供求均衡状况等密切相关。从本质看，通货膨胀是一种市场“极化”引起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是一种与资金配置、资产配置方向密切相关的经济现象。

其次，应弄清楚欧美这次通胀严重程度如何。传统经济理论将通胀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温和的通胀，通胀率在3%左右，这类通胀不仅对经济无害，甚至对经济有利，因为适度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类为加速的通胀，通胀率达两位数或较低的三位数，居民抢购房地产而资本市场崩溃；第三类为恶性通胀，通胀率超过了较高的三位数，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崩溃；第四类为隐蔽的通胀，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实行价格管制和实物配给制，但实质通胀率却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货币发行规模越来越大，衡量通胀率的基数也越来越大，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对通胀的分类，已不合时宜，甚至对经济决策产生重大误导，比如当通胀率达到10%时，实际上通胀已经很严重了，但按照传统经济理论的分类，10%的通胀率归为加速的通胀，并不算严重，这样政府可能推行温和的政策，进而错过治理通胀的时机。可对传统的通胀分类进行修正，将通胀分为三类，一是适度通胀，通胀率一般在3%左右，这与传统分类相同；二是恶性通胀，通胀率超过8%；三是超级恶性通胀，通胀率超过三位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滞涨时期，欧美国家出现恶性通胀是不争的事实，以1976年至1979年为例，欧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为8%至9%之间，所以，当一国通胀率超过8%可定性为恶性通胀。欧盟2022年5月通胀率超过8%；美国2022年6月通胀率为9.1%、7月为8.6%，英国5月通胀率为9.1%、7月达到11%，均创近40年新高；荷兰通胀率2022年7月达到10.3%；法国通胀率5月为5.2%、6月为5.8%、7月为6.1%，均为1985年以来最高水平；德国7月通胀率近8%；西班牙7月通胀率为10.8%；葡萄牙7月通胀率为9.1%；希腊7月通胀率为11.6%。除欧美国家之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爆发恶性通胀甚至是超级恶性通胀，阿根廷2022年8月通胀率高达71%，土耳其6月通胀率为78.6%。

最后，应弄清楚造成欧美这次恶性通胀的核心原因。传统经济理论将通胀成因分为两类，货币因素以及非货币因素。货币因素是指货币供给过量同时利率过低造成通胀，货币主义理论基本持单一因素决定观点，即货币因素是造成通胀的唯一因素。非货币因素主要与供求密切相关，主要包括需求引致因素、需求结构变动引致因素、生产率差异引致因素、成本引致因素、供求共推引致因素以及惯性因素等。需求引致的机理在于，当总需求大幅扩张，货币供给量同时相应大幅增加，会引起通胀，所以一般在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容易出现通胀，但有时在衰退阶段，也会出现通胀，即滞胀，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欧美经济已经存在滞胀的端倪和潜在风险，通胀难以治理，而滞胀更难对付。需求结构变动引致因素以及生产率差异引致因素都与产业结构以及其他“结构”因素密切相关。成本引致因素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工资成本、利润和进口成本，这种因素的机理在于，若出现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状态，则会导致通胀，而垄断企业通过抬价获取额外利润，也会引起通胀，此外，进口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导致本国发生通胀。供求共推引致的机理在于工资增加之后，既提高了生产成本又增加了需求。惯性因素是指通胀发生之后，由于惯性力的作用，即使所有引致通胀因素消失，也会继续存在一段时期。

弄清造成欧美这次恶性通胀的核心原因极为重要，否则就不能“对症下药”。传统货币通胀理论并不能解释此次通胀产生的核心原因，仅仅停留在货币超发解释通胀更是片面的。这里提出国际“热钱”资产配置转向理论。

一般观点认为，造成此次通胀的原因主要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供给方面，由于疫情造成供应链危机，增加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消费成本；二是气候以及地缘冲突等因素引起能源价格上涨，即突然发生的新一轮能源危机，因为从2020年的能源数据看，是不可能出现能源危机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21年下半年突发能源危机；三是逆全球化的抬头导致贸易成本增加；四是次贷危机之后货币超发的“后遗症”等等。无疑，上述几个方面都是造成此轮通胀的原因，但并不是核心原因，核心原因在于国际热钱投向突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不影响通胀的楼市、股市、币市等“突然”转向大宗商品市场。这种“突然”既“突然”也不“突然”。称其为“突然”，是指欧美国家根本没有意识到国际热钱投向会发生转变，或者并没有在意国际热钱投向的转变。称其为“不突然”，是指欧美国家泡沫经济经过长达十几年的繁荣，累积的泡沫已经很大了，国际热钱必然寻找新的资产配置方向。国际热钱的威力是巨大的。次贷危机之后，货币超发滋生了空前规模的国际热钱，它们大量涌入楼市、股市和币市，比如2020年至2021年欧美国家房价普遍大涨，不少国家这两年累计涨幅达到20%。楼市、股市、币市价格暴涨，并不会直接引起通胀，因为其价格上涨不计入CPI。当欧美楼市、股市累计的泡沫巨大时，规模巨大的国际热钱突然于2021年下半年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突然暴涨，引起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大增，进而引发恶性通胀。2022年7月美国二手房签约量是自2022年以来第六次下降，其原因为高房价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国际热钱从楼市中逐步撤出。2022年上半年欧美股市大跌，也说明国际热钱从股市中撤出。

（作者系经济学者）

鲍威尔的严厉及“后通胀时代”变化

【缘木求鱼】

鲍威尔严厉加息的举措，对美国外市场的巨大消极影响已经显现。

木木

当地时间9月21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虽然与此前市场主流预期吻合，但美股三大股指仍“破预期”地大幅收跌。市场人士对此的解读是，因为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过于“严厉”——年底前还将加息100至125个基点——的缘故。

“严厉”，显然是一个相对概念。年底前再加息超过100个基点、使利率水平升至4%以上，相较于逾四十年未见的严重且有点儿顽固的通胀而言，或许也算不得太过“严厉”；如果一通操作之后，通胀态势仍不能明显缓解，目下的所谓“严厉”措施，或许约略理解为“刀子嘴豆腐心”式的管束也未尝不可。

不过，相较于此前的鲍威尔，现在的鲍威尔肯定已经“严厉”多了。如果大家记性还不错，去年的时候，面对日益严峻、已经远超预期的通胀形势，鲍威尔的态度却一直温和得很，“暂时性通胀”的个性化“标签儿”，现在回过头来看，把其定性为一种对通胀的委婉“激励”，大约也问题不大。直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鲍威尔面对通胀的态度才给人一些认真的感觉，但评论通胀形势以及美联储的职责时，口气仍温柔得很——比如“我们真的需要恢复物价稳定……”，比如“我们认为衰退并非不可避免……”

与那些日子相比，鲍威尔现在对通胀的态度无疑严厉多了。有多严厉呢？不单口气变得很严厉，话里话外传达的意思也严厉得多。比如，他表示，为了将通胀率拉回2%的水平并稳定住，将致力于提高利率并将利率保持在高位，“坚持下去，直到工作完成”。比如，他表示，更高的利率、缓慢的经济增长、走软的劳动力市场等显然都对公众不利，但这些都比不上价格水平迟迟难以稳定（对公众）造成的痛苦。比如，鲍威尔主导下的美联储，对今年以及明后年的GDP增速、失业率给出了更悲观的预期……

鲍威尔态度的转变，是“身在其中者”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反应，对旁观者、对市场中人更好地理解美国通胀形势显然有很大帮助。站在阶段性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鲍威尔对美国通胀的自然反应，肯定是慢了好几拍，这造成的直接问题是，通胀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美国经济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大大增加；同时，对美国之外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造成了严重困扰，而这又会反过来消极作用于美国问题的解决。

目前，市场人士和美联储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通胀形势稳定下来并实现向预定目标的回归，应该是明年下半年乃至后年初的事情。总体而言，这样的预期肯定算得上相当乐观了，形势演进果真若此，当然皆大欢喜。但是，结合目前世界形势、市场环境综合考量，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极大。一个阻止世界经济和社会逐步恢复并重归发展正轨的重要消极因素是，曾经一度形成并趋向完善的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否定力量”，以邻为壑的做派正日益成为一些人的本能选择。这种选择，显然没有出路，因为四十多年前的“沃尔克时代”的相关实践，已经对此给出过回答。如果不能跳出历史的窠臼，重归正确路径，鲍威尔的严厉态度和手段，恐怕就有相当大的机会，载入美国通胀治理的史册。

鲍威尔严厉加息的举措，对美国外市场的巨大消极影响已经显现，造成的危害日益加深，一切仿佛都在“计划”中“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站在鲍威尔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副产品”——既然美国人都要忍受加息造成的巨大“痛苦”，那么，美国之外者随之“痛苦”一下，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这么想，当然很可以理解。不过，如果站在“美国外”的角度看待此事，感受恐怕就会有所不同，毕竟，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哪怕是再没记性的人，总归也会长些教训——于是，“后通胀时代”的走向，或许就会有所变化。也是，不发生点儿变化，无论在道理上还是人情世故上，似乎都有点儿说不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将领的培养决定了胜负

【想入非非】

洋务派开办的军事学校里，除了枪炮操法以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战术战略之类的课程，学校也不实行军事化管理，没有任何体育课程。

蔡非

谈起北洋水师覆灭这个话题，过去百年有很多说法。比如“慈禧挪用军费”、“炮弹灌沙子”、“李鸿章保船战略失败”等等。

现在我们都认同，“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那么在北洋水师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特别重视军官们的作用。

因为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技术，军舰之间的联系必须靠旗语，而战场上信息瞬息万变，更多时候必须依靠舰长——当时叫“管带”的判断力。

当年海战的当事人，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就评价：“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很多北洋水师军官，不是战死就是自尽，所以在生死大节上大部分都是守住了。但客观来说，在战场上的整体表现并不合格。

为什么不合格？我们不妨从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来看看。

由于那句“撞沉吉野”，吉野号防护巡洋舰在中国算是家喻户晓。

从战史来看，至少三艘北洋军舰的击沉或被俘（致远、经远、操江）和吉野号有关，同时它还重创了超勇、扬威、来远三舰。

除了吉野号本身的性能出色以外，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

河原要一，出生于1850年。比邓世昌小一岁，比刘步蟾等人大两岁。

他在1871年即21岁时，进入了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行3年制教学。从建校开始就全盘照搬英国皇家海军的教育传统，据说连学生宿舍所用的砖头都是从英国进口的。

当时应日本邀请，英国派出以道格拉斯（后来一直做到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少校为首的34名教官到日本教学，直接把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搬到日本。全英文授课，作业也要求英文完成，日语简直从军校里消失了。

现在日本中小学学校运动会中有一个很具观赏性的项目叫“倒木桩”，这个项目是将参加者分为两组，在保卫自己组的木桩不被对手放倒的同时，争取放倒对方的木桩，这是一个既拼体力又拼智力的项目，因为攻守同时进行。这是从战前的海军兵学校学来的。

1874年，江田岛海军兵学校首次召开了名叫“竞斗游戏会”的运动会，这就是现在日本学校、企业等各团体每年都要开一次的“运动会”的开始。

同时期北洋水师的军官们在干什么？我们拿1852年出生的刘步蟾举例，他在1867年进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同样是3年教育。

而后，他上了训练舰建威号实习，驶经厦门、香港、新加坡、渤海湾等地。2年后结束实习，以学堂首届第一名毕业。

初看起来也不错？但深究问题就大了。

首先，日本海军兵学校的课程一开始就是面向培养海军指挥官的。而福建船政学堂也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教学也以英文为主，所开课程有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其中英文和算法是贯穿堂课始终的课程。

发现少了什么没有？

除了枪炮操法以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战术战略之类的课程，更像是在培养民船船员。

另外，学校也不实行军事化管理，没有任何体育课程。1874年秋，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到福建船政学堂访问，学生们用毛笔缮写算学作业的工整程度让他惊诧。

但英国军官最后却给出了尖酸刻薄的评语：比起在海上作警戒工作，这些学生更适合在佛龛里呆着。

为什么呢？英国人认为是教育方式的问题，由于缺乏体育课程，下课后这些学生只是呆呆坐着，没有表现出海上男儿应有的粗犷和活泼。不懂运动，也不懂娱乐。

福建船政学堂主办者也知道这个问题，但他们觉得没关系，因为3年理论学习后，学生还有长达2年的上船实习呢。

但实际上，由于船只的缺乏，名义上长达2年的上船实习，学员实际上只能有2个月待在船上。更糟糕的是，过去3年的培养模式，已经使得学员们更多地把自己当成了传统士人。

在上舰实习期间，据外籍教师观察，这些未来的军官们极不情愿弄脏手指，连海军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参加。

好容易实习结束了，这些清朝第一代海军军官达到了什么水平？据记载，船政学堂当时与外籍教师签订的合同中，要求5年时间里，把学员培养成能在“望见远山之海面”航行即可，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近海航行就算达到了目标。至于应该具备怎样的与敌决战于大洋深处的能力，这个一开始就不是培养目的。

而反观同时期的日本海军，自1874年起就创立了远航制度，毕业生要到澳洲甚至美洲进行几个月到半年的远航实习。后来的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毕业后更直接被派到德国海军巡洋舰“维内塔”号和“莱比锡”号上进行实习，一直到4年以后才返回日本。

1876年，李鸿章从英国买了4艘军舰回来，让这些已经接受了5年训练的军官试着操控，却发现他们“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而隔壁的日本海军学员，已经作为低级军官，频繁出现在欧洲海军的舰艇上。这时候差距就已经拉开了。

于是，在1877年，洋务派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中中选出12个人，前往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到英舰队的各种军舰上实习，留学期限定为3年，而其他没被选上的，则直接上了新买的军舰当舰长。

这12个人有一半人在入学考试中就被淘汰了，只有6个人正式入学。他们是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林永升、萨镇冰，其中严复后来转为文职工作，何心川中途因病退学，林永生在战争中英勇捐躯，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执行军法，最后只有萨镇冰和叶祖珪一直到战败还留在海军中。

而反观日本联合舰队，除吉野号的河原要一外，接受正规训练，在欧洲海军中长期实习的人员比比皆是。在打赢北洋水师后10年，这批人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海军。

所以，尽管有邓世昌等人的奋战，但北洋水师仍然在没有击沉任何一艘敌舰的情况下被全灭。这一苦涩的结局虽然不幸，却未必无由。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